文史百题

辽代契丹文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崛起，对于中国文学史的丰富性、多样性做出了别开生面的重要贡献。辽代契丹文文学以其“义理深微”的表达能力与汉文文学一起，积极参与了中华文学的构建过程。在新的世纪，为了使中国文学史的架构突破场域狭小、内涵单一的传统模式，建立视野开阔、一体多元的科学体系，亟需下大的气力切实使上述状况有所改变。

辽代契丹文文学发微

□周惠泉

在中国文学史上，从辽代开始的四百馀年，由于契丹、女真、蒙古族的崛起和北方民族文化的南渐，在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相激相融、互动互补中，辽、宋、金、元时期成为中国文学频繁整合、急遽更新的重要转型期。其中勃兴于辽代的契丹文文学，正是携带着契丹民族游牧狩猎文化威武有加、健勇无比的宝贵元素参与了北雄南秀、气象万千的中国文学史的整体构建，成为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正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和其他复杂的历史原因，包括契丹文文学在内的有辽一代文献几乎人为地散佚殆尽，为我们在辽亡近九百年以后认知和解读契丹文文学的原生态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不过，悉心钩沉辽、宋、金、元时期的相关文献，庶几尚可追寻契丹文文学发展的线索脉络。在新的世纪，为了使中国文学史的架构突破场域狭小、内涵单一的传统模式，建立视野开阔、一体多元的科学体系，亟需下大的气力切实使上述状况有所改变。

建立辽朝的契丹族本是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之一，源出崛起于大兴安岭的鲜卑人，是鲜卑宇文部的一支。早在公元4世纪时，他们即活动于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以车帐为家，逐水草放牧。我国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文献最早记录契丹民族活动的，是成书于北齐的《魏书》，当在北朝魏代道武帝拓拔珪之时。其后，契丹族先后依附于突厥和唐朝，贞观二十二年(648)，唐朝在契丹驻牧地设置松漠都督府。唐末藩镇割据，唐室衰微，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乘势而起，统一各部，并在唐朝灭亡的当年907年即可汗位，接着称帝建辽。其时辽"东朝高丽，西臣夏国，南子石晋而兄弟赵宋，吴越、南唐航海输贡"(《辽史·地理志》)，包括据有中原人文荟萃之地的北宋在内的四周邻邦，均须视辽之马首是瞻，在祖国北半部开创了烜赫一时、威震东亚的兴盛局面。由于声名远播，影响巨大，当时中亚、阿拉伯和西欧诸国大都以"契丹"称谓中国。甚至直到现在，世界上有些国家和民族如俄罗斯仍把中国称作"契丹"。

契丹文的创制，在辽代初期。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以后，十分仰慕中原文明，并大力提倡儒学，兴建孔庙，设太学，开科举，使文化事业得到快速发展。辽朝建立以前，契丹人"本无文字，惟刻木为信"(《五代会要·契丹传》)，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耶律阿保机的倡导和支持下，契丹文字的创制便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契丹文字分为大字与小字，契丹大字由耶律突吕不、耶律鲁不古创立，契丹小字由耶律迭剌创立。耶律突吕不(？—942)，又作耶律突吕不也，字铎衮，六院部人，幼年聪敏嗜学，颇受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器重。神册五年(920)正月，受阿保机之命仿照汉字始制契丹大字，当年九月制成颁行。不久仕为文班林牙(相当于翰林院官员)，领国子博士、知制诰。太祖经略幽燕地区，天赞二年(923)皇子尧骨(即后来的太宗)任大元帅，突吕不为副，以屡立战功，受到嘉奖。天显十一年(936)，奉命送晋主石敬塘入洛，大册时突吕不并总礼仪事，遂加特进检校太尉。契丹大字的另一位创制者耶律鲁不古，字信宁，乃辽太祖阿保机从侄，参与制成大字后授林牙，监修国史。会同元年(938)，率偏师为西南边大详隐(将军)，征伐党项有功。适逢河东节度使石敬塘为其主所讨遣人求援，鲁不古导送于朝。帝如其所请，御驾亲征，鲁不古随帝左右纵横驰驱，战功卓著，天禄(940—950)中拜于越(位居大王之上的高官)，为北院大王，享年五十五岁。而契丹小字的创制者耶律迭剌(？—926)字云独昆，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之弟，性机智敏捷，太祖曾谓"迭剌之智，卒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然图功,吾所不及;缓以谋事,不如我"(《辽史·皇子表》)。回鹘使者到访,无能通其语者,淳钦皇后述律氏告太祖曰:"迭剌聪敏可使。"于是派其接待,"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接受中原帝王权力世袭的封建传统,而废除契丹人代代相因的世选制度时,迭剌参与其兄剌葛谋反,"太祖杖而释之"。天赞四年(925)十二月,太祖东征渤海国,迭剌投笔从戎。天显元年(926)正月,渤海灭亡,太祖改渤海为东丹国(即东契丹),册皇太子耶律倍为东丹王,任命迭剌为左大相,辅佐皇太子治理渤海旧地。同年七月,耶律迭剌在东丹国病逝。上述三位契丹文字的创制者,作为辽代建国初期出现的第一代"知识分子",集中体现了契丹人劲健尚武、骁勇剽悍的民族气质和民族性格,与中原地区汉民族的文人大不相同。他们以开放的心态、进取的精神和好学的品格,从汉文化以及其他民族的文化中汲取养分,在本民族历史上破天荒地创造出同民族语言相衔接的视觉符号系统,从而制成契丹文字,开我国北方民族创造本民族文字的先河,并对其后女真文字的创制产生了示范作用和直接影响。耶律突吕不、耶律鲁不古、耶律迭剌三人既是文臣,也是武将,堪称文、武兼备的杰出人物。如此文经武略荟萃于一身的人才,在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见的。契丹大字主要是受汉字的影响,增减汉字笔划创制的,它沿袭汉字横平、竖直、拐直弯的书写形式,又直接借用了一些笔划简单的汉字。契丹小字则参照汉字和契丹大字的字形,同时借鉴回鹘文的拼音方式制成。从契丹大、小字创制到停止使用,前后长达三百年的时间,此后在中亚的西辽国仍然继续使用。

契丹文字在文学上的应用,主要是创作与翻译。比如《辽史·耶律倍传》称耶律倍"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金代集大成的文学家元好问在《东丹骑射》一诗中也有"意气曾看小字诗"(《元好问全集》卷14)之句,可以印证东丹王耶律倍擅长用契丹小字作诗;而《契丹国志》谓辽圣宗耶律隆绪曾经"亲以契丹字译白居易《讽谏集》"(卷7《圣宗天辅皇帝》);《辽史》则称耶律庶成"善辽、汉文字,于诗尤工"(卷89《耶律庶成传》)。《辽史》中常有某某工辽、汉文字或辽、汉文章之语,都是指擅长以契丹文和汉文写作。而耶律倍、耶律隆绪、耶律庶成、耶律庶箴、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耶律良、萧韩家奴、耶律固、寺公大师等，都是重要的契丹文作家。辽代初期的契丹文作家耶律倍(899—936)，小字图欲，幼聪敏好学，神册元年(916)立为皇太子，曾经从征乌古、党项，为先锋都统，并治理文化较为发达的幽燕地区。太祖西征，留耶律倍守京师。天显元年(926)正月，从太祖东征渤海；渤海灭亡，太祖改渤海国为东丹国，以耶律倍为人皇王统治其地。天显元年七月，太祖自渤海回军途中驾崩，淳钦皇后称制主政。耶律倍知太后欲立其弟德光，乃提出让位。于是耶律德光即皇帝位，是为太宗。太宗改东平为南京，迁倍居住，又派人监视倍的动静。后唐之主明宗，乃两次派人跨海持书邀请耶律倍。于是耶律倍携高美人载书浮海避之后唐，后唐明宗赐姓东丹，名慕华；复赐姓李，名赞华。明宗养子弑君自立，耶律倍秘密上书耶律德光，派兵征讨，终为唐明宗养子李从珂所害，年仅三十八岁。太宗耶律德光将耶律倍改葬于医巫闾山，谥文武元皇王。耶律倍"浮海适唐"、离开大辽时所作的《海上诗》，是一首契丹文和汉文合璧的双语诗：

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

诗题中的"海上"和诗作中的"山"既是汉字，也是契丹字。所谓"海上"即"郎主"(君主)之意。"海上诗"即郎主诗，契丹语的"海"与"郎"为同音词。至于"山"，作为契丹小字的写法其右上方实际应加点，为兄弟之意。我们知道，契丹文字是仿照汉字创造的，契丹字中有不少与汉字字形相同或相近。而契丹语中"弟"与"山"同音，共用一个契丹字表示。由于契丹文字在金朝后期停止使用，因而后人对于契丹字的含义往往不甚了了，便望文生义、穿凿附会了一个"立木海上"的故事(见《辽史·耶律倍传》、《契丹国志·东丹王传》)。那么，此诗是否与海上无涉呢？当然不是。因为耶律倍投奔后唐走的是海路，不仅《辽史》本传称其"载书浮海而去"，而且《辽史》本纪也有"(天显五年)十一月戊寅东丹奏人皇王浮海适唐"的记载。面对茫茫大海和漫漫前路，将要离开家乡的诗人感到无限惆怅，于是写下了这篇意蕴无穷的力作。其中"小山"隐喻其弟耶律德光，"大山"乃诗人自喻。耶律倍将皇位让给其弟德光，不仅未得厚待，反而遭到疑忌。按常理小山是压不住大山的，但是现在大山却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无力改变受压的命运。字里行间虽无怨恨之辞，却多羞惭之意，只好在莫可奈何中接受友邦邀请、远离家乡而避之后唐了。清代文学家赵翼评赞此诗“情词凄婉，言短意长，已深有合于风人之旨矣”，可谓独具慧眼，一语中的。这首诗的可贵价值，不仅在于生动形象地表现了皇位继承问题在兄弟之间产生的矛盾冲突；而且在于它把汉文和契丹文巧妙地组合起来，使之成为一首双语合璧而空前绝后的佳作。汉文与契丹文优化组合，在耶律倍这首《海上诗》中得到了完美而充分的体现，达到了两种文字相辅相成、互文互训的修辞效果。

辽代中期以后，社会的安定促进了文学的发展。清代诗人沈德潜在《〈辽诗话〉序》中指出：“圣、兴、道三宗，雅好词翰，咸通音律……文学之臣，若萧韩家奴、耶律昭、刘辉、耶里(律)孟简，皆淹通风雅。”其中辽圣宗耶律隆绪(971—1031)为东丹王耶律倍之曾孙，小字文殊奴，乃有辽一代武功文治颇为突出的君主。史书称：“圣宗幼冲嗣位，政出慈闱。及宋二道来攻，亲御甲胄，一举而复燕、云，破信、彬，再举而蹴河、朔，不亦伟欤！……辽之诸帝，在位长久，令名无穷，其惟圣宗乎！”(《辽史·圣宗纪》赞)在其任内的早年，母后承天皇太后(俗称萧太后)奉景宗遗诏摄政时通过“澶渊之盟”达成与北宋的和议，实现了北、南两朝的和平相处与友好往来，为辽朝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创造了稳定的外部环境。耶律隆绪幼喜书翰，十岁能诗。既长，精射法，晓音律，好绘画。他非常喜欢白居易的诗作，自称“乐天诗集是吾师”(《诗话总龟》引《古今诗话》)，曾经亲自以契丹文翻译白居易的《讽谏集》，召臣下诵读。还大力提倡诗歌创作，出题命宰相以下百官赋诗，诗成一一品读，优者赐其金带。耶律隆绪君臣的作品、特别是契丹人的作品，肯定包括不少契丹文创作。可惜这些作品随着辽朝退出历史舞台和契丹族融入其他民族，大多已经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辽代的契丹文作家，往往具有我国北方民族纯朴、真率的鲜明个性，与中原地区在“君君臣臣”观念禁锢下的汉族封建文人大不相同。其中，萧韩家奴(975—1046，字休坚，契丹涅剌部人)是辽代名臣、中书令安抟之孙，少时好学，弱冠入南山读书，博览经史，兼擅辽、汉文章。统和二十八年(1010)，掌南京栗园。重熙初，同知三司使事。重熙四年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035),迁天成军节度使,徙彰愍宫使。辽兴宗以其诗才杰出,命为诗友。不久擢升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兴宗对其有"以卿文学,为时大儒"之誉。萧韩家奴不仅以诗才文笔名世,也以直言极谏著称。《辽史》本传对此有明文记载:

> 韩家奴每见帝猎,未尝不谏。会有司奏猎秋山,熊虎伤死数十人,韩家奴书于册。帝见,命去之。韩家奴既出,复书。他日,帝见之曰:"史笔当如是。"帝问韩家奴:"我国家创业以来,孰为贤主?"韩家奴以穆宗对。帝怪之曰:"穆宗嗜酒,喜怒不常,视人犹草芥,卿何谓贤?"韩家奴对曰:"穆宗虽暴虐,省徭轻赋,人乐其生。终穆之世,无罪被戮,未有过今日秋山伤死者。臣故以穆宗为贤。"帝默然。

虽然当时辽兴宗对萧韩家奴"日见亲信"、"君臣相得无比",但是作为文臣其襟怀坦荡、知无不言如此,千载之下令人为之击节称赏。萧韩家奴曾经以契丹文字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奉诏与南院大王耶律谷欲、枢密直学士耶律庶成编撰辽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并著《六义集》十二卷行世。由于有辽一代对书籍外流严加控制,从辽代开始的数百年又战乱频仍,还有其后正统观念流毒深远的人为因素,终使这样一些十分珍贵的文献未能传留后世。

至于辽代有幸保存下来的契丹文作品,以哀册、墓志一类应用文字为主,例如耶律良撰写的《辽兴宗哀册》、耶律庶箴撰写的《仁懿皇后哀册》、耶律固撰写的《辽道宗哀册》和《宣懿皇后哀册》,以及《耶律延宁墓志》、《北大王墓志》等。而契丹文诗歌,有铜镜所存契丹文诗作。比如吉林大安出土的诗镜,背面铸十六个契丹小字,乃是一首四言诗,二、四末字押"灭"韵;原朝鲜王室博物馆藏七言诗镜,背面铸二十八个契丹小字,一、二、四句末字押"练"韵。可见押韵规则与汉文诗相似,说明了汉文格律诗对契丹文诗歌的影响以及彼此之间某些共同性的语言现象。契丹族诗人寺公大师的契丹文长篇诗作《醉义歌》,则堪称契丹文化与汉文化融合互补的结晶。虽然原文失传,现存元代契丹族诗人耶律楚材的汉语译作,载于《湛然居士文集》卷八,诗的开头称: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晓来雨霁日苍凉，枕帏摇曳西风香。困眠未足正展转，儿童来报今重阳。吟貌苍苍浑塞色，客怀衮衮皆吾乡。敛衾默坐思往事，天涯三载空悲伤。

这是一首吟唱醉中真义的歌行体长诗。从诗的内容看，作者为遭受排斥而远谪他乡的人。诗人醉中的议论，显然受了道家、佛家和儒家思想的影响，特别是道家“万物一齐”(《庄子》)思想的影响。作为道家学派代表人物的庄子，主张人应该按人类的自然本性去生活，荣辱、贵贱、福祸、成败等都是相对的、虚幻的东西。这种不求闻达、适己任性的人生态度，与寺公大师当时的思想状况十分契合，因而诗人在《醉义歌》中以庄子的哲学观念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就不奇怪了。当然诗人所汲取的，既有来自汉民族典籍中的思想资料，也有取自辽朝统治民族契丹族的价值观念。如“泰山载斫为深杯，长河酿酒斟酌之”的宏大气魄，“四时为驭驰太虚，二曜为轮碾空廓”的出奇想象，“陶陶一任玉山颓，藉地为茵天作幕”的苍凉格调，都与契丹民族劲健尚武、豪放不羁的精神气质密切相关。至于诗的意象旷阔雄奇，艺术风格壮浪恣肆，则是“文如其人”的最好体现。它们给中国诗歌史增添了新的因子，注入了新的活力，为汉文化与契丹文化的整合更新、优势互补进行了可贵的创造。《醉义歌》的契丹文原作，能把如此充沛的情感、丰富的内容和缜密的思想天衣无缝、栩栩如生地再现出来，说明契丹文文学已经达到很高的发展水平，为读者了解和认识契丹文字过硬的表达功能提供了可靠的范例，特别是在契丹文作品传留极少和难以解读的情况下确实使后人大开眼界。关于《醉义歌》的作者寺公大师，耶律楚材在该诗汉语译作的小序中称：“辽朝寺公大师者，一时豪俊也。贤而能文，尤长于歌诗，其旨趣高远，不类人间语，可与苏、黄并驱争先耳。”这样一位杰出的契丹文作家，辽亡以后不仅其生平事迹不可确考，甚至连其真实姓名也难以知晓，足见辽代文献散佚的严重程度。因而元人在《辽史》修成以后呈递元廷的《进辽史表》中所谓“国既丘墟，史亦芜茀。耶律俨语多避忌，陈大任辞乏精详”的说法，确实反映了修史的客观状况。耶律俨、陈大任是辽、金两代分别撰修辽实录和辽史的文臣，耶律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俨(？—1113)活动在辽代后期的辽道宗、天祚帝时,以"监修国史"的身份在天祚帝乾统三年(1103)奉诏编纂《皇朝实录》七十卷;他为析津(今北京)人,本姓李,其父李仲禧道宗咸雍七年(1071)仕为汉人行宫都部署时赐国姓耶律,后曾同耶律乙辛等权臣诬陷皇太子。陈大任主要活动在金朝中期的金章宗时,章宗泰和六年(1206)七月以翰林直学士之职奉诏专修《辽史》,次年十二月完成。耶律俨《皇朝实录》和陈大任《辽史》,是元人修撰《辽史》的主要根据。而寺公大师在辽朝以其足以同北宋代表性作家苏轼、黄庭坚"并驱争先"的文学成就与历史地位,理所当然地有资格载之《皇朝实录》并进入《辽史·文学传》,遗憾的是由于《皇朝实录》的秉笔者耶律俨乃是一个"善伺人主意"(《辽史·耶律俨传》)的曲意逢迎之徒(《契丹国志·李俨传》),像寺公大师这样受到当局排斥的人自然很难进入其视野、留驻其笔端,从而在《皇朝实录》中占有一席之地了。因为耶律俨"语多避忌"而没有提供的素材,自然无法体现在金人和元人先后所修的《辽史》当中。在"国既丘墟,史亦芜蒨"的情况下,这不仅是寺公大师的不幸,也是辽代文学的不幸。虽然辽代杰出诗人寺公大师《醉义歌》的契丹文原文作为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地永远消失了,所幸由金入元的契丹族诗人耶律楚材为我们留下了该诗的汉文译作。

契丹语言文字对于北宋人也产生了一些影响。据《契丹国志》卷二十四记载,北宋使者余靖、刁约出使辽朝,都曾以契丹语入诗。其中"余尚书北语诗"条云:

> 余靖尚书使契丹,为北语诗,契丹爱之。再往,益亲。余诗云:"夜宴设罢(侈盛也)臣拜洗(受赐也),两朝厥荷(通好也)情斡勒(厚重也)。微臣稚鲁(拜舞也)祝若统(福佑也),圣寿铁摆(嵩高也)俱可忒(无极也)。"国主举大杯,谓余曰:"能道此,余为卿饮。"复举之,国主大笑,遂为酬觞。

余靖(1000—1064)字安道,北宋韶州曲江(今属广东)人,仕宋为集贤院学士、工部尚书,为皇祐、嘉祐名臣,先后三次使辽。其诗文弃华取实,流畅自然,这同他与契丹人的密切接触不无关系。余靖此诗实际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上并非单纯的“北语诗”,而是契丹语和汉语的双语诗,当时受到辽朝最高统治者的垂青与激赏,在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史上传为佳话。

辽代契丹文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崛起,对于中国文学史的丰富性、多样性做出了别开生面的重要贡献,在新的世纪构筑中国文学史完备框架和科学体系的过程中应该引起注意。实际上,金代高度重视女真文化的金世宗完颜雍,在辽亡五十馀年以后的大定二十年(1180)就契丹文文学与女真文文学进行对比时,即曾心悦诚服地指出:“契丹字年远,观其所撰诗,义理深微,当时何不立契丹进士科举。今虽立女直字科,虑女直字创制日近,义理未如汉字深奥,恐为后人议论。”(《金史·选举志》)其中对契丹文文学与女真文文学各自达到的水平进行了近距离而直观的权威评价,认为契丹文和用契丹文创作的诗歌已经发展到颇为先进的程度。这一看法,是心平气和、客观公正的。有辽一代的契丹文文学,正是以其“义理深微”的表达能力与汉文文学一起,积极参与了中华文学的构建过程。在进入21世纪的当今时代,以多民族的中国文学观对于契丹文文学以及整个辽代文学的着力钩沉与深入探索,必将有助于破除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根深蒂固的正统观念,推动中国文学史学科体系与时俱进的转型与跨越,从而为中国文学史在辽、宋、金、元时期的整合演化进程呈现一个走势强劲的起点。

(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我与中华书局的人和事

我是从上世纪30年代入中学,直到读完大学,一直有中华书局相伴,但我与中华书局有正式学术交往却是在上世纪的50年代末。近半个世纪的交往应该说有过不少人与事的联系,渐渐形成对中华书局有一种总体认识。中华在上个世纪确实对社会的文化建设有其重要的贡献:它向社会呈现了大量为人们所公认有学术价值的优秀著述和读物,对作者的学术生活给予了帮助与推动,使学者的学术成果得以公诸于世而无名山之憾,同时更培养了一批学者型的编辑家和出版家。我以一个曾是长期的读者和作者的身份,祝愿中华书局开拓创新,传承文明,为中国出版事业树一典型,在新的世纪里有超越过去的更大成绩。

(作者:来新夏　摘自《我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2002年)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